

哲学译丛

ZHIXUE YICONG

一九七八年

3

哲学译丛 (双月刊)

一九七八年 第三期

目 录

列宁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思想〔苏〕 K. 伊万诺夫 (1)

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东德〕 H. 斯托伊斯罗夫 (7)

论现阶段对科学的管理问题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共产主义组 (14)

关于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先导 〔苏〕 Б. М. 凯德洛夫 (18)

再论物理学中的可观察性原理和互补原理并兼论辩证法
..... 〔苏〕 М. Э. 奥米里扬诺夫斯基 (26)

数学与辩证法 〔东德〕 H. 李普舍 (33)

苏联社会面貌的新特点 〔苏〕 B. C. 谢苗诺夫 (41)

苏联工人阶级 〔苏〕 T. T. 季莫菲耶夫 (44)

苏联农民阶级 〔苏〕 П. И. 西穆什 (46)

关于苏联的生产关系 〔法〕 B. 夏旺斯 (50)

学 术 概 况

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研究 〔苏〕 A. T. 巴甫洛夫 (54)

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和发展前景 〔南〕 B. 彼特洛维奇 (60)

苏联国内的科学和哲学(下) 〔美〕 L. R. 格雷厄姆 (66)

法国关于马克思的逻辑学的讨论 〔东德〕 V. 冯·弗罗布莱夫斯基 (71)

书 刊 评 介

评费多谢耶夫的《现代辩证法》一书 〔苏〕 B. H. 舍夫琴柯 (75)

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几本新的学术著作 〔苏〕 A. T. 德罗班 (76)

美、英、法、比、瑞士、西德、日本一九七七年上半年哲学论文要目索引(上) (79)

列宁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思想*

〔苏〕K. 伊万诺夫

政治活动是上层建筑关系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上层建筑关系又是某一社会经济形态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政治活动又同生产关系（就其对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说，它起着经济基础的作用）有着有机的联系。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有关经济方面的政治的理论则好象是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因为政治不仅是由经济产生的，而且还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由此可见，撇开经济方面的政治，不可能形成有关社会关系的完整概念。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研究政治活动同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是完整而全面地阐明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按计划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出发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同时特别重视经济方面的政治这个问题。早在 1844—1846 年，马克思曾经写过一本书，按他的构思，该书应当成为两卷本的《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他提出了一项任务，即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但是该书的第一卷却未能见诸于世。

马克思计划在《资本论》各卷之后，专门写一卷——《国家》，以便阐述自己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政治的理论。大家知道，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写这一卷。但是在他写作《资本论》时，并没有把经济方面的政治置于不顾。他认为，经济要求是在政治思想对其起反作用的情况下得到发展的，而政治思想则是从经济要求中产生出来的。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都合盘托出”。^①

如果说撇开资产阶级的经济方面的政治不可能想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显然在研究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时，也不能仅限于分析生产关系的体系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经济方面的政治置于不顾。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组成部分，在其著作和演说中制定了整个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他从各方面研究政治的中心。

列宁创造了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全部基本思想，这一思想不

* 本文摘译自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真理报》主编 B. Г. 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对社会的科学管理》（年鉴，第二辑，1977 年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撰稿）一书的第二篇。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 页。

仅对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且对从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列宁教导说，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其活动的基础是组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领导其发展，这对于我国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是加速国际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列宁写道：“……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实际命运……”^①。“……经济工作乃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对于我们是最有意义的政治活动”。^②“现在，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③他指出，社会主义具有榜样的力量。

列宁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活动的原理，创立了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完整理论，这一理论是全部社会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研究列宁关于政治活动问题的思想，使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列宁关于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理论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占有突出地位。

列宁所制定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定义，被人们普遍地承认为最完整的经典定义，因为它表明了经济和政治是相互不可分割的，表明了二者的统一和相互作用；这个定义包括着对下列问题的回答：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社会领域从其来源和产生来看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和决定性的？从阶级斗争观点、从一个阶级解决其任务的观点来看，政治和经济哪一个占首位？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经济”这一术语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被使用的。这一术语，从狭义上说要么仅指物质技术基础和劳动过程，亦即仅指生产力；要么仅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经济制度。“经济”这一术语，从广义上说，所表述的则是生产过程本身各种规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为该生产关系体系所特有的全部规律和范畴（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积累规律、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等等）。

从广义方面来理解的“经济”，它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技术、生产和交换在物质技术基础上的统一；第二层意思是：生产力的两个物质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和劳动过程）的统一；最深一层意思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成熟了的新需要和新倾向的统一和相互作用。换句话说，从“经济”这个概念的最广义上说，它既反映人和自然界的全部关系的总和，又反映人们在生产、交换和分配方面的全部关系的总和。

所有上述关系的总和有如一座巨大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建筑物”。掌握这一经济“建筑物”，人民就把全部经济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当我们把经济看作是人们在社会中从事活动的主要的、决定性的领域时，我们就恰恰是从这种无所不包的意义上理解经济的。当我们谈论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时，我们恰恰也应从这种对经济理解出发来说明经济。只有社会生产力本身和其社会形式的规律、规律性和范畴的全部总和，才能成为全部政策（即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权力之所以对经济有巨大作用，就因为政治是以全部经济为自己的基础的。

政治的最深刻根源是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活动从来都是在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影响下形成的。只有对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经济利益进行深刻的分析，才能科学地规定政策的内容和方向。

列宁的经济政策（从其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来看）的特点是：

（1）对解决经济问题持科学态度；这意味着，政策乃是对现实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要

①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列宁全集》第30卷第322页。

②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32卷第422页。

③ 同上书，第427页。

求所作的客观分析的反映；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之前，必须科学地预见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全部变化，要对远景规划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有明确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设想；（2）目的性：任何经济措施都应有助于“充分”保证“社会全体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①（3）保证不断加强工人阶级和人民知识分子的联盟；（4）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保证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5）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

列宁不仅把政治、政治工作看作是一门科学，而且看作是一种艺术。墨守陈规、死板僵化、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是任何一种艺术所不能容忍的，这些东西尤其是政治所禁忌的：政治上墨守陈规和形式主义，其后果必然是造成物质上的和政治上的损失。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政治在客观上必然分裂为两种相互敌对的政治：剥削者的政治和无产者的政治。这两种政治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是通过上述两种政治活动间的持续的对抗性斗争来实现的。

从资本主义赋予生产过程以社会性时起，资产阶级政治已经不反映生产力客观运动的要求，而这种政治由于它是剥削者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所以它与生产力的状况和性质处于不断的和日益尖锐的冲突之中。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不可能分裂为二，因为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权主人是掌握政权，消灭了敌对的阶级并受到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培育的人民。

资产阶级世界观、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割裂政治和经济，把政治说成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依赖于经济的独立领域：政治似乎取决于国务活动家的意志、愿望，甚至某些偶然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政治和经济的有机联系和它们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经济和政治在客观上的相互作用，其间的统一，体现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列宁的定义之中，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政治和经济基础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或阶梯：这是由它们之间那种极为密切的有机联系所决定的。政治，一方面集中地和直接地反映着生产力的状况以及在其中发展着的各阶级的社会联系和经济利益，同时又积极地作用于生产关系并通过生产关系而作用于生产力。政治不可能绕过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而直接作用于生产力。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和相互联系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等同的，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混同起来，尤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们生活的经济条件及其政治条件混同起来。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也不意味着社会生活这两个领域彼此之间是相互渗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过程的分析不容许把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混淆起来，而要求精确地说明生产过程本身、经济关系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的特殊作用和特点。政治和经济不能相互割裂，它们彼此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对它们却必须十分严格地加以区别，因为它们是人们活动的两个领域（在统一中发展着）而不是一个领域。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也不容许把它们相互联系庸俗化。不能把每个经济方面的政治行动都看成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政治并不是算术。取得这一或那一经济利益往往要求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行动。数字并不总能说明某些政治问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并不大的情况下，却可能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好处。

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完全不意味着在这个统一体中这两个社会领域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37页。

起着同等作用。原初的、决定性的基础是经济，这里所说的经济是指这一概念的最广泛的意义。但是在论述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著作中，经济这一概念通常只限于指生产关系，即仅指经济基础。如果从这种有局限的意义上来看待经济活动，那么从这些或那些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方面来说，经济活动就起不到第一性的原初的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生活的最深刻的基础（即劳动过程和物质技术基础）就被排除在外了。

经济和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极为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领域。但是，不管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纷繁复杂，不管这种关系是如何千头万绪和具有多少中间环节，归根到底经济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改造自然界和经济。然而，如果放弃科学态度并把政治的作用绝对化，那就会直接导致唯意志论。

无论政治活动多么复杂，归根到底，它都取决于经济条件。只有这种或那种经济要求才能产生出这种或那种政治思想。

但是，政治并不是经济活动的消极反映。政治是对客观经济过程发生作用的强有力的手段。政治同经济相比，它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1）这种或那种经济要求不能在对它发生反作用的那一政治思想（产生于该经济要求）之外发展和得到满足；（2）政治对经济所起的作用本身。因为政治不仅集中地反映经济，而且是对经济的总结和完成；（3）政治对经济发生巨大的影响。

政治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政治上的逻辑并不是经济上的逻辑的翻版。

与此同时，无论政治对经济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客观上，即在现实生活本身中，政治是不能脱离经济的，它对经济来说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

主观因素，即政治的作用和意义，随着群众的政治意识的发展和经济领导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增长。但是这种独立性永远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掉自己的相对性，因为经济始终都是决定性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作用的增加，劳动群众政治成熟性的增长，不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在增长，而且政治的相对独立性的程度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政治活动脱离经济活动、政治脱离经济的情况。这种可能性还来自下述情况：由于政治活动具有惰性，这就会使政治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经济要求和趋势的情况变得严重起来。

唯有科学的态度，唯有对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对决定政治的全部因素的深刻认识和研究，才能保证不使政治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变成绝对的、不依赖于经济的独立性，亦即保证不使政治活动同经济活动发生冲突。在苏维埃社会的历史上，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短暂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国的经济方面的政治脱离了经济，我国的政治活动中混进了唯意志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成分。

政治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反作用不是别的，就是国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国家权力的这种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一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越来越坚决地干预经济。但是由于私有制、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占统治地位，国家起不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社会，情况则完全不同。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的条件下，对全部国民经济活动的规划和经济管理是由国家来实现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关，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国家从经济上利用计划、经济管理和全部经济杠杆来加速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

国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实现全部政治权力。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政治权力则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时，国家，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客体，掌握全部经济权力。国家在自己手中集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这一点使一些人把国家不仅看成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看成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类观点歪曲了政治和经济的真实的相互关系。

从国家既掌握政治权力同时又掌握全部经济权力这一事实出发，并不能得出下面的结论：国家不仅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应当看到，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是把生产者联合在一起的社会，而我国的所有制又是全民的；国家代表人民并为了人民的利益而采取各种经济措施。这样，国家就作为所有制和经济管理的第二性的主体（第一性的主体是人民）的身份出现。而且，随着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建成，全民所有制将保存下来，而管理经济的国家形式则将消亡；这也表明把国家包括到基础中去是不对的。

政治活动不是经济活动的一方面或一部分，因而国家也不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如果把国家看做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那它就会失掉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也就取消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

1921年，在就工会问题所展开的尖锐辩论中，列宁提出了一个原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①。在我国的著作中对列宁的这一原理有不同的解释。不久前流行一种论点，按照这种论点，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位似乎是指：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从经济起决定性作用转为政治起决定性作用，已经不是经济要求产生政治思想，而是相反，政治是产生这种或那种经济要求的第一性的原因。实际上，这里我们所遇到的是对列宁关于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所作的唯心主义的和唯意志论的曲解。当我们谈论整个政治或这种那种政治思想产生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十分清楚：经济是第一性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

列宁赋予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位的原理以什么含义呢？

列宁指的是如下事实：一个阶级要想在经济上取胜，要想成功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要从对自己有利出发来解决经济任务，他必须同其他阶级进行斗争，并在建设自己的经济中把政治利益放在首位。这一阶级可以在当前作出一定的经济牺牲，其目的则在于在将来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或政治领导，从而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创造可靠的保障。

在这里必须引用列宁1920年11月3日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②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1921年在关于工会的辩论过程中，托洛茨基坚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里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是明显的，这里根本取消了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布哈林维护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的提法。这一提法多少掩盖了政治和经济的割裂。列宁揭露了布哈林观点在理论上的荒谬，他写道：“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因为政治的职能和使命在于集中地体现经济。列宁写道：“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①。

如果说政治集中地体现着经济，是经济的总结和完成，那么对于经济领导人来说，唯一正确的立场只能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立场。任何把从政治上看问题与从经济上看问题调和起来的作法都是不容许的。列宁写道：“……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如果说，我‘尊重’你从政治上看问题，‘但是’，这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你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你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②

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位的意思是：国家领导国民经济和解决经济任务的基本原则是：在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位的前提下来考虑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导经济工作和管理社会生产不是部分人的事，而是全体人民的事。社会的每一个劳动者就如同是全民生产过程这一统一整体的主人的一个有机组成分子。这赋予每一个工作者在任何领域（生产领域或非生产领域）中从事的活动以政治的性质。根本的经济任务同时也是政治任务。这些经济任务是在党和人民用集体智慧预先制定的计划基础上解决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活动的有效形式，其前提是：预先对生产和社会领域中发生的变化作出科学的预测。因此，计划性必然向党、向人民、向计划体制提出一个要求，即要把有关前景的政策同当前政策区别开来。

大家知道，为了制定这一或那一经济措施，需要进行先期的实验，而实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为了使全体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能够认识新过程、新变革（特别是急剧的变革）的必要性，也是需要时间的。

因此，当前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或多或少地落后于前景趋势。如果这种落后的危险性不存在，那就无须为党的总路线、为实现以未来为目标的主要方向而斗争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当前政策也有可能加速客观运动，因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是远景规划所不能完全预料到的。

实现党的经济方面的政治的前提是：对现有可能性和资源的经济潜力作出估计；对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形成的国际经济联系作出估计；在经济领导的实践中采取集体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国民经济；对人们的政治成熟性和意识、以及他们对实际实现政治决定的素养和能力的程度作出估计；对不断改变的形势作出估计并及时地适应这些变化；干部对已通过的决议认真负责并加以贯彻。

（原载苏联《对社会的科学管理》一书。申岩摘译）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42页。

② 同上书，第441、442页。

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东德〕H. 斯托伊斯罗夫*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区别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区别是把历史看作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观在理论上的一个决定性的出发点。只有作这种区别，才有可能在科学上严格地、唯物主义地研究和理解社会生活。必须从唯物主义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出发，才能从理论上说明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如同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强调指出的，一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就是说，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物质客观活动，其目的在于改变和把握客观现实；这是一种有意识地进行的活动。同纯粹的自然过程不同，社会的运动是通过人的物质活动，也就是作为实践进行的。而人的思想，以至于人的意识，只有作为实践活动的因素，借助于人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关系，才能在社会上和历史上发生作用。因此，问题在于从人的所有社会生活关系中，从人的实践活动的所有社会形式中，找出第一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根基，即“基础”，并在这种关系之上建立起派生的关系，即“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词来表示人的第一性的物质社会生活关系和人的第二性的思想社会生活关系之间普遍的合乎规律的联系。

很明显，这两个词在认识各种极其不同的关系时是起作用的。在科学的社会理论中，基础概念是指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指构成整个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关系。与社会的基础概念不同，上层建筑概念是指建立在物质关系基础上的、并依此为根据的那种社会关系。由上所述，“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也总是彼此相关的，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任何情况下重视这一点，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只有作为必然相互联系的概念，才能表达它们的含义。例如把现实的某种现象看作基础，只有使这种现象同另一种现象发生关系，才能真正具有意义。这同样适用于“上层建筑”这个名称。基础总是关于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而上层建筑总是某些别的东西之上的上层建筑。因此，如果人们首先提出“什么”或哪种现象一方面“属于”基础而另一方面“属于”上层建筑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当人们首先探讨用两个概念加以把握的有规律的联系时，提出这个问题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不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以前，唯心主义观点处处统治着社会理论领域。列宁说明了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在认识论方面的特征。他说：“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

* 作者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讲座教授、博士。

这个充分表现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①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不是把政治法律形式连同作为其根据的观念归因于它们的现实基础，归因于生产关系。唯心主义社会学家把国家、法律和道德这样的思想关系解释成由观念决定的、并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因素。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似乎就是由人自觉地、按意志创造和建立的，这种结论是和社会实践矛盾的。因此必须弄清楚思想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而思想关系借以形成的那种社会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是：在社会观念影响下直接形成的思想关系，不是什么独立的和决定的力量——归根到底，思想关系仅仅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上面、在生产关系上面形成一种上层建筑。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它们是和它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马克思作为理论家第一个认识到，“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②“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③同这些话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特别看清楚我们应该如何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例如不能从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属于上层建筑这样的问题出发。我们应该从下列问题出发，即思想关系在全部社会关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们是不是决定性的（如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或者它们是不是由别的关系决定的（象历史过程的实践经验表明的那样）。对思想关系的真实地位的把握要同实践经验相一致，正是为了这种目的，马克思才引入了“上层建筑”这个词。与此不可分地联系着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上层建筑以什么为依据，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涉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联系。我们不是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词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经常独立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因素或社会力量，每一种东西就其自身而言，或者是基础，或者是上层建筑，而是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词来表示思想社会关系和物质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有规律的联系。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说明哪些社会现象属于基础，哪些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这样一种含义。我认为，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恰当的说法是：“就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而言，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它是由那种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一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思想关系的体系，也就是由基础所决定的、反映基础并反作用于基础的那种社会关系、社会观点、社会观念和社会机构的体系。”^④

长期以来，不论在苏联的哲学著作中，还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哲学著作中，关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不同观点的讨论一直在进行，而这种讨论还不能说早已结束。这种讨论特别涉及到“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的范围，例如涉及到“基础”这个概念是作广义理解还是作狭义理解的问题；涉及到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在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如何“分类”的问题；涉及到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发展和结构的关系，涉及到客观的物质资料在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其他方面。很明显，在这种讨论中，旨在说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建立过程中的新特征的那些问题，是特别重要和特别有趣的。我想在下面表明对上述要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态度。

让我们从多年来一再成为讨论对象的问题，即“经济基础”这个概念的范围谈起。这个概念或者是仅仅同作为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的生产关系有关，或者是也把生产力包括在内，因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7—8页。 ②③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43页。

④ A·鲍威尔等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柏林1974年第24页以下。

此也就是同整个生产方式有关——讨论总是在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下进行的。G.阿勒柯山德尔中肯地指出：“目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基础和上层建筑所进行的讨论业已表明，这涉及到更加熟练地把握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范畴，以便在解决那些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正在到来的共产主义阶段的逐步准备中产生的复杂问题时，作出战略决断。”^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一书的作者们要求“在像‘基础’的概念这样的定义问题上，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样的规定能最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上层建筑的真实变化”时，我们也可以同意他们的意见。“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把握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有规律的联系的理论概念。它们决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始终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假如有人由于科学阐述的需要就说“基础产生上层建筑”，那是不正确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始终是人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联系。而这些关系，正如 G.斯提勒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都要由人加以建立（“产生”）、发展和改变^②。

但是，上面引用的作者们的意见在“基础”这个概念的范围方面是有分歧的。上面提到的那部著作的作者们主张，“‘基础’概念作为同‘上层建筑’相关的概念，它的精确定义并不包括生产力”。^③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提到马克思的名言。马克思说，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就是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此外，他们提出两个“绝对有理”的论据。第一：“马克思不是直接从生产力或它的个别方面，而是从依赖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的物质社会生活关系体系中导出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过程。”他们通过进一步的论证，使他们的第一个论据更加明确。他们说，“思想关系依赖于生产关系是直接的，但依赖于生产力仅仅是间接的，而且要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第二：他们认为，如果基础的概念也同生产力联系起来，那么人们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这尤其会导致同意资产阶级的论点：生产力发展的各个要素首先是技术——和社会设施、社会斗争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④

与此不同，阿勒柯山德尔和斯提勒所代表的论点是：“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连的社会经济基础，它们的存在离不开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普遍历史形态。”阿勒柯山德尔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同意他们关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想法，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既涉及到上层建筑性质的规定，也涉及到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方向和社会结果。但是，明确地排除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现实内容，这是毫无理由的。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作过这样一种排除的定义。……马克思总是用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把物质生产力和同它相适应的客观生产关系看作一种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它们是对立的方面，甚至可能互相矛盾，而且会陷入尖锐的冲突。马克思正是在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中看到整个历史过程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使人把历史仅仅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⑤接着，阿勒柯山德尔就作出了基础概念的狭义理解和广义理解的区分，他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是正确的：例如，“马克思在十分明确规定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的地方，就使用对基础概念的狭义理解。然而正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表明的，狭义的理解总是置于广义的理解之中。……凡是说明社会发展的地方，就使用广义的理解。”如前所述，就狭义而言，好象只有生产关系才能理解为基础，而另一方面，就广义而言，基础好象与作为整体的生产方式是等同的。相反，阿勒柯山德尔好象总是在相同的范围内使用上层建筑的概念，然而一次是考

① 阿勒柯山德尔：《评鲍威尔等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载东德《德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9期第1250页。

② G·斯提勒：《论把握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方法》，载东德《德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11期第1477页以下。

③④ 鲍威尔等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第40页。

⑤ 阿勒柯山德尔：《评鲍威尔等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引书，第1251页。

察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另一次是考察社会形态的发展。

我认为，阿勒柯山德尔区别为狭义的基础概念（借助于这个概念来说明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广义的基础概念（借助于这个概念来说明社会的发展）是不恰当的。这种区别在性质和发展之间划了一道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的鸿沟。连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在发展，而它本身就是发展的结果。因此，严格地从逻辑上考虑，我们也不能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它的发展会由不同的东西来决定。但是在两点上，阿勒柯山德尔的论据（斯提勒的论据也一样）包含着人们必定注意到的合理内核。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分析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时创造并使用了基础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不需要去讨论的确定不移的事实。第二，阿勒柯山德尔和斯提勒如果是在确认，只要人们离开物质生产力来考察上层建筑发展、思想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发展就不能得到说明，那么，他们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考虑生产关系和物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必定不仅涉及到要说明上层建筑的发展，而且也同样涉及到要说明上层建筑相对不变的特质。或者换一种说法：《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者们认为要把生产力从经济基础的概念中绝对地排除出去，这种观点在这种“狭隘的意义”上是不能成立的。在这里就能看出，我决不因此说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是等同的，决不把物质技术基础理解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但我认为有必要比鲍威尔和阿勒柯山德尔更精确地理解生产关系的概念。

当我在下面表明我对上述讨论的问题的立场时，我特别注意到两个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克服讨论中碰到的难点，而且有可能使分歧的意见趋于一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所表现的辩证法的灵活性，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从概念上反映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的联系。关于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没有看到狭隘的、片面的和机械的理解的痕迹。凡是经典作家谈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地方，他们总是想以此表达一定的关系，表达决定的和被决定的、本原的和派生的社会现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我认为，只有我们辩证地规定我们的理论概念，只有我们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解为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现实联系之中的普遍联系，并在此通过特殊性表明其特征，我们才能摆脱困境。

我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意识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因此我来谈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继续进行讨论是重要的。生产关系构成思想社会关系的基础。思想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种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关系制约和决定的，它反映生产关系并对生产关系发生反作用。就此而言，使基础的概念不同整个生产方式，而同生产关系，同社会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同意 A. 鲍威尔等人的论断。就这方面来说，经济基础的概念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指生产方式的总和，不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此外，需要对上述提到的作者们的意见提出一个批评。

按照他们的理解，生产关系不仅同生产力相区别，而且相分离。不仅物质生产资料被排除在外，人对物质生产资料关系的社会形式，人使用和利用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也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就成了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脱离任何物质客观现实的关系。在阐述中，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到生产关系和人的物质关系——以人对物、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中介——是互相联系的。十分明显，对生产关系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同经典作家的理解相矛盾的；这样一种理解是不能成立的，在方法上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借助于这种理解不能说明真正的历史进程，因为从这种理解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必定导致错误。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序言。他在其中强调指出，生产

关系——基础——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同样写道：“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①在这里，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所作的区别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没有把它们互相分开，他也把握住它们相互渗透的因素。

作为人们相互间的物质社会关系的这种既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生产关系本身的要素、组成部分。恩格斯在他同杜林的论战中指出了这一点。他尖锐地抨击了人对人的支配能够离开人对物的支配这样一种想法。只要存在着人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②列宁在他研究社会阶级差别时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提法。他把各阶级之间的差别归因于生产关系，并在这方面把“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称为阶级差别的第一位的和主要的经济特征。^③

对经济基础的定义考察的结果可以确定如下：1. 对思想社会关系体系的决定性的基础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种基础是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构成人们相互之间的物质社会关系，这种物质社会关系是人的思想社会关系的基础。就此而言，决没有什么必要的理由要区别为广义的基础概念和狭义的基础概念。2. 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它以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为中介。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概念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和占有的方式是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就此而言，经济基础的概念不是什么必须扩大的太狭窄的概念。经济基础的概念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而言的，它也始终包括人对物质生产力的关系，因此为了既说明思想关系的结构，又说明思想关系的发展，这个概念肯定足够，而且是远远足够的。

最后提到的这个观点还需要加以说明。首先应该考虑到，思想社会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也要以人对物的关系为中介。这种上层建筑当然不仅包括人的意识的社会形式，同时也包括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思想关系——这不单纯是人们相互之间观念上的联系，而且始终是实际的社会关系。A·鲍威尔等人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算作思想关系的……既有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形态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要素，也有各种机构。”特别是各种机构，没有一定的物质资料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国家机器就包括一定的物质资料。因此，思想关系像生产关系一样是以对物的关系为中介的。但是，思想关系毕竟是派生出来的、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反映生产关系的关系，而且决没有理由把思想关系算作物质的社会关系，如在著作中部分出现过的那样^④。我同意鲍威尔等人的看法：“当然，那些思想关系——上层建筑机构是它的体现——不纯粹是思想的机构，因为思想关系发生作用要借助于真实客观的机关。但是，并不是这种机关决定自己的本质，尽管这种机关能发生最大的实际影响。例如，国家拥有足够的武器和其他的物质强制手段，并不能把物质社会存在的性质赋予给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方向，国家机构的性质，甚至整个国家的要求，一般地说是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所以，国家，还有类似的其他上层建筑机构，就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上说，它们是第二性的，是从基础里派生出来的思想社会关系。”举个例子来说，资本家们在思想关系中对国家机器的物质客观资料的支配权力，反映了他们在生产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62—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225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10页。 ④ 参见：A·考辛《哲学的基本问题》，柏林1974年第72页。

系中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力。资本家们的经济权力——它以资本家们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为基础——是资本家们的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他们的政治权力是以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支配为中介。上层建筑的阶级结构反映了经济基础的阶级结构。

如果我们看一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考察，那么很清楚，他们恰恰赋予一切思想关系的真实客观中介以不可低估的意义。同时，我们认识到，他们在这方面总是指出上层建筑和物质生产力之间的直接联系。恩格斯在同杜林论战时写道：“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于是，也就由此得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②马克思也强调指出思想关系对作为中介的物质事物的依赖性：“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③我认为，绝不能怀疑在上层建筑和物质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直接的依赖关系。上述作者们^④的相反的论断是事实相矛盾的。

重视物质事物在思想关系中的作用以及重视物质事物对物质生产力的依赖性，对于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这一点对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符合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利益的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这一任务来说，是特别明显的。这一任务就包括工人阶级接管对物质客观资料的支配权。没有这种实际的支配权，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工人阶级政权的影响力，无可争辩地完全取决于物质资料的质和量，而物质资料的质和量又直接受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影响。或者，工人阶级仅仅为了不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有唯一直接联系这一理论原理发生矛盾，难道就应该放弃生产和使用在技术上最现代化的和最有效的武器而赤手空拳地对付用原子武器武装起来的阶级敌人吗？恩格斯写道：“和现代军队比较起来，手无寸铁的人民在军事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的。”^⑤不言而喻，一个在军事上“微不足道”的无产阶级，即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权，又不可能在思想上或别的什么方面有什么权，就不可能在社会上进行统治。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们不能片面地、机械地理解上层建筑的内部结构以及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论证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为了能够说明上层建筑、它的发展与作用，为了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必须研究有各种各样差别的依赖关系。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社会生活各种不同的方面变得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要求为实践精确规定我们的理论论述。这种理论论述也要在概念方面考虑到现实的辩证法。

当然，我认为不能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共产主义形态的发展中至少会部分地“倒转过来”，或者上层建筑的几部分——首先是国家——将失去它们作为上层建筑的性质而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5—206页。

^② 同上书，第2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63页。

^④ 参见：A·鲍威尔等人：《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第4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253页。

为基础的要素或者获得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作为上层建筑起作用，一方面作为基础要素起作用。这种错误的观点在著作中多次遭到批判。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一些作者想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积极性中找到社会主义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中的崭新的东西。这是从一种错误的前提出发，即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似乎没有国家的帮助，生产关系一般也能产生，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生似乎是同上层建筑相分离的，而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似乎没有国家也能实现。这种前提对剥削社会的历史是不适用的，是同人所共知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间普遍承认的事实完全对立的。在剥削社会的一切时代，如果说整个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对生产关系、基础的产生和发展发生过影响，促进过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它就起过一种积极的作用。

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是在封建国家原则上承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赞助下形成的，因此法律关系起过一种积极的作用，人们真能怀疑这一点吗？人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看到，例如法国封建制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如何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不是恰恰在于压迫被剥削者，保卫和促进私有者阶级的统治吗？有一种观点假定，没有上层建筑的协助、促成和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也能产生和发展，这种观点以不容许的方式把唯物史观简单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教导我们说，没有思想关系，经济关系照样产生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说，经济关系不是由思想关系决定的，而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思想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共产主义的形态。从任何方面都不能说什么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倒转”。工人阶级借助于自己的国家权力来有计划地、自觉地和有组织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工人阶级能随意根据某种主观愿望作到这一点吗？工人阶级的意识、意志能决定如何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用什么步骤最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实行新的生产关系、按什么方向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完善新的生产关系吗？当然不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随什么主观愿望相适应，而是由物质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由此产生了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客观必然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积极作用必然在于建立、发展、实行和完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作为经济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即在国家权力按另外一个方向发生作用时，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偏离了这个方向时，都会发生困难，造成对生产力的阻碍，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最后甚至造成对已夺取的工人阶级政权的破坏或损害。工人阶级的国家以及新的上层建筑的所有其它要素，必须把目标集中到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上，因为它们需要把这作为自己的基础，否则它们一般是不能存在的。

恩格斯关于国家的作用所说的话，即使对于共产主义形态的发展也是有效的。他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¹⁾

(原载东德《德国哲学杂志》1977年第4期 宏远摘译 志学校)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483页。

论现阶段对科学的管理问题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共产主义组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科学的社会作用不断增长。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科学成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它把越来越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苏联科学工作者的人数 1940 年为 9,8300 人，1971 年增长到 100,2900 人。如果把科学技术人员和其它服务人员同时计算在内，那末在科学活动领域内从事工作的人数达到 337,4000 人。这已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 强，占国民经济中在业总人数的 4% 左右。每年科学工作者数量的增长超过其它任何社会活动领域。对科学活动拨款的情形也相类似。

但是科学的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已不能主要依靠科学工作者人数和研究费用的增长来实现。这种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将科学活动的涣散方式变为集约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显著提高科学研究效率，正确选择主要方向，减少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设计及其实际应用之间暂时的脱节现象，确定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合理比例。

从这一观点看来，以统一的国家政策为基础对科学事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实行统一的科学技术政策，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趋向的分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的估计，是制订全国科学技术政策的依据。全国科学技术政策保障我们能够最合理最有成效地利用科学技术资源。

今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中共同的迫切问题可能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改善管理科学事业的系统。这种改善取决于科学机关数量的迅速增长及其结构的复杂化，取决于科学工作干部技能水平的提高和科学发展速度的加快，取决于由科学所解决的任务的复杂性和范围；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专业化和相互协作，以保证加快科学发展的速度。合理利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条件，并在它们的基础上组织全面的协作；

——根据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合理配置科学中心；

——参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的经济改革，改善科学机关中的劳动组织系统。增加对科学家们的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使他们更加关心完成科学研究工作并将其成果应用到实际中去；

——加速把已经完成的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

在我们的时代，那种认为科学活动不需要加以管理的观念是非常落后和错误的。越来越明显的是，现代科学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一个系统的构成物，因此必须建立对科学事业实行集中领导的一定形式的组织机构。这种领导在今天不局限于科学的技术应用或工艺应用领域，而越来越把理论上的探索性研究包括进来。对科学事业的集中领导既决定于科学本身发

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于必须保证科学活动与其它社会活动领域(工业、农业、文化等等)保持联系。

在对科学事业实行集中领导的同时，不能不估计到由于片面地和过分地强调对科学集体的集中管理所产生的消极趋向。在全国范围内对科学工作的集中管理，应该与具有一定灵活性的领导组织形式相结合。这种领导组织机构除了负责统一调配力量，制定计划纲要和进行监督以外，还应有助于科学家们发挥首创性和自由创造的探索精神。

在这方面，科学的组织工作与工业生产的组织工作不同。在工业生产中，用尽一切办法统一工艺的构件、零件和元件的规格，并使生产过程标准化，这是进步的表现，是对手工业方式和手工艺特点残余的克服。在科学工作中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硬性地统一规定科学集体的结构，这会降低它们的活动效率。一般说来，把各种意见统一划齐的作法是科学工作所禁忌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任何垄断真理权的企图除了给科学事业带来破坏以外，什么也不会带来。在某些情况下，适宜于在不同科学集体的工作中规定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同一课题。为了保证在科学上看法自由，应该鼓励发展不同的科学学派，鼓励不同学派之间展开创造性的竞赛。

把科学机构组织中的稳定性和机动性结合起来，寻找那样一种组织形式，它保证科学工作者有广泛的可能性从研究某一类问题的工作中转移出来，去从事解决另外一些有时是完全新的问题，这是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制订出科学研究工作的这样的组织形式，必须注意过去在这方面的经验(既包括正面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经验)，进行精细而周密地思考过的、在理论上有所根据的社会实验。

看起来，在现在的条件下按照科研题目建立科学机构的原则是最适宜的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们有可能为解决共同的综合性任务(而现代科学问题的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把各种不同专业的科学家的努力联合起来。除为了解决一定的任务建立一些小组和部门之外，使各研究所的内部结构服从于按科研题目划分的原则大概也是比较适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使科学探索获得广阔的自由，发挥科学工作者的首创精神。

大概不需要证明，科学工作者的创造能力依赖于对他们进行培养的质量。所以改进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要紧的是，要使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统不仅完全适应于现代科学水平，而且同时适应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和形式。主要的问题在于，要充分满足科学在最新研究方向上对专家的要求。科学技术进步的利益，要求在保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有部门按比例发展的条件下，去规定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决定性成就所依赖的那些主要科学部门专家人数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速度应是有科学根据的，高于其他部门的。为了与科学和生产的发展远景相适应，这种比例关系必须经常加以修订。

科学工作干部的现有专业结构过去和现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发地形成的：每个部门在确定应增加的编制时，总是以本部门的内部需要和现有设备为根据，而从未估计到整个科学事业发展的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各企业和机关提出的申请，规定各高等院校培训专家的类别和数量。结果某些主要专业的工作者的数量和比重产生了一定的不合比例的现象。例如数学工作者，包括理论控制论、数理逻辑等方面的专家在内，仅占全部科学工作者的3%，这在许多方面的知识走向数学化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够的。在那些有前途的知识部门，如化学和生物学部门中，科学工作者数量增长的速度在最近二十年内低于国内科学工作干部总数增长的平均速度。医学科学工作者人数增长的速度是低的。很明显，计划机关应该考虑